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

张柏然 许 钧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 / 张柏然 许钧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ISBN 7-100-03473-6

I. 面… II. ①张…②许… III. 翻译—研究—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86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IÀNXIÀNGÈRSHÍYĪSHÌJÌDEYIXUÉYANJIŪ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

张柏然 许钧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473-6/H·889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5/8

定价: 32.00 元

编者絮语

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前,人们都会对 20 世纪进行回顾与反思,也都会对 21 世纪做出理智的展望。在此世纪转换之际,作为对逝去的岁月的思考,更是为了较系统地总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领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回答译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未来的走向作一些积极的探索,我们组织、编纂了这部《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的文集。

文集内所收 45 篇论文,均出自我国外语界长期以来专事或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之手。文章的作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译学或作理论性的元思考,或作学科分支性的研究,抑或做应用性的研讨,都力图从特定的学术视角对各个专题进行准确的诠释,注重抓住一些关键性问题和环节,找准症结,在总揽实际和翔实的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思路;并依据现状,提出今后的主要研究任务和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文章向世人展示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新时期 20 年来在译学领域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们在融通中西译学、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译论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翻译,这个激动人心的字眼,曾诱使许多抱负满怀的才子才女们跃跃欲试,将火热的青春投入到翻译活动中去;翻译学,这门自人类文化启蒙时代就孕育的学问,现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

2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

然而,为什么为数不少的搞翻译研究的莘莘学子们热情锐减,感叹找不到感觉?又为什么这门既有历史又有积淀的学科在众多人的心目中形象并非那么鲜明、印象并非深刻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可形象地说:翻译学虽是巨龙,然而人们尚未发现它的“眼睛”,甚至可以说尚未“点睛”。走进 21 世纪的翻译研究要达至“大成”,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渊深宏通、胸襟开放、又新锐高效的学术创新体制。

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这既是事实性的(实然),也是表达性的(应然)。同时,翻译学的“科学特性”与“文化性格”在一般意义上并非相悖,而是有机结合的。它们从不同角度说明翻译活动的特点,前者是从外在的、表层的、规范的方面;而后者则从内在的、深层的、精神的方面来说明。只有历史地认识到翻译学活动这两方面,方可说完整地理解了现代翻译学活动。

中国是一个有着 5 千年文明史,近 2 千年翻译史的国家。古代的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译学遗产,这一遗产在世界翻译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人类翻译学史经历了神话与习俗的时代、哲学时代和语言科学时代,21 世纪将发生文化转向,进入文化时代。基于此,21 世纪中国翻译学应该站在对 20 世纪乃至有史以来中国及世界各国翻译学传统进行文化批判的基石上,对现实的翻译问题进行文化的分析,探求与新文化发展相符合的翻译学道路;同时从对实际翻译活动中的“纯翻译问题”关注中拓展为对现实个体和整个民族文化命运的关怀,为百姓和民族文化

的新生寻求合适的翻译策略。怎样使我国古老的翻译和文明传统保持活力,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怎样发展中国译学和文化研究,在新的世纪里为世界译学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怎样在翻译研究中既继承传统,又保持活力,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怎样发展中国译学和文化研究,在新的世纪为世界译学研究既继承传统,又跟上时代的潮流,从而保持文化上的先进性和创新性?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翻译理论界有人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民族行将日益消亡,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不应再过多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强调民族性、本土性,否则就有违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阻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持这种见解的人显然是把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与民族性、民族特色混为一谈,以至于陷入民族性与世界性二元对立的理论误区。

何谓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充满矛盾的过程。只有将一体化与多元化、集中化与分散化、求同性与存异性、全球化与本土化有机地统一起来认识,才是我们对待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的正确态度。全球化在文化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原来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这里至少包含这样两层含义:一是世界文化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人类的共性)结合的产物,二者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文化的世界性寓于民族个性之中,并通过民族个性体现出来;文化的民族个性则不同程度地蕴涵着人类共性。这是民族文化能够为他民族所认同和接受并成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基本原因。(这也是翻译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和本原)二是从文

化本身的外部关系看,世界文化是指由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本体通过相互交流、对话,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世界性的文化关系。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只有按照上述辩证的观点去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才能促使我国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向世界。

何谓“民族”?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民族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文化共同体,而文化则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生存根基。失去了文化身份和特征的族群,仅仅是相对于“牲口”的“人口”,根本谈不上是独立的民族。因此,我们不仅要坚决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而且要充分尊重世界各国其他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只有坚持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我们才能营造多元平等对话的世界文化新格局。

在强势文化在世界流通时,怎样保留文化的深度,为这世界多保留一份精彩,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强势文化正在对众多的非强势文化进行一种“脱色”处理,使这些文化面临灭绝的危险。这种灭绝大于物种灭绝给人类生态带来的危险。对此,作者提出,我们所寻求的是与西方对话,而不是对抗。我们要寻求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有共同的话题,才能引起对话,有不同的声音,才能引导对话的深入。共同的话题,指的是共同的智慧水平上和人类共同关注点上的对话,而不同的声音指的是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资源,发挥不同的独创性。

要在全球对话中建立中国译学理论的现代体系,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此外,要对极其丰富复杂的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的搜集、整

理、考订和理论把握,即“现象统观”。它可以比较充分地吸收和转化中国传统的翻译学的学问,从而以比较深厚的功力,在本色的意义上展示与西方译学发展不同的中国译学历史过程,进而在宏观上建立中国翻译学。

对比西方译学理论思维,中国译学理论思维是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此,在全球性跨文化对话中,中国译学理论要把握住自己的身份标志,有必要利用自身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进而以感悟翻译哲学来破解中国思维方式的核心秘密,融合中国翻译文化的基本特征,在西方译论走向形式科学的同时,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译学对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建设,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译学研究必然与文化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联系文化来研究译学,才能对译学的意义和作用有深入的了解。从“文化”概念出发,超越从前种种“从翻译学认识翻译学”或“从某一哲学派别认识翻译学”等把翻译学看成一组孤立地利用概念、实验技术等认识过程的老路,而从文化哲学、文化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角度入手,把翻译学看成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特殊活动方式,利用大量相关材料,把它的研究对象、运用的概念、提出的命题、包藏的隐喻、理论的演进等等,统统纳入或还原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加以整体地分析与理解、揭示它们与文化之间内在关系及由此而具有的文化特征,把握住“翻译学的文化性格”,以回答“翻译学是什么”这一翻译学的根本问题。各个国家和民族

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些文化传统和特点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血液中。随着全球生产力共同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思想文化的极大提高,全球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有可能本质上趋同,但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则会是永久的多元。

我们始终认为,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弘扬文化的民族独创风格,不但不会阻碍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而且恰恰是有益于解构当今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者试图借“全球化”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策略,有益于真正实现多元共存互补的文化全球化目标。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就可能出现众声喧哗独无我的尴尬且悲哀的局面。为此,我们必须从我国翻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经济的交往会变得越来越密切。这一发展对译学与文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同一化。经济全球化是与文化上的多样性并存的。人类要建设一个丰富多彩的未来,就必须要保持这种文化上的多样性。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任务是在多样化的世界文化中发展我们的中华文化,让中国译学走向世界。

中国现代翻译学应该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寻求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惟如此,才是世界性的翻译学。我们的目标是繁荣和发展中国译学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翻译评价体

系,使中国翻译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译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编 者

2001 年元旦

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目 录

编者絮语.....	(1)
-----------	-----

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杨自俭(1)
------------------	--------

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	张柏然 张思洁(19)
-----------------------	-------------

译学要敢为天下先	许渊冲(34)
----------------	---------

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	王东风(52)
--------------------	---------

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	谭载喜(73)
-----------------------	---------

学术范式:西方译学的启示——世纪之交关于中国译学	
--------------------------	--

研究的理论思考	傅勇林 朱志瑜(87)
---------------	-------------

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	张南峰(111)
---------------------------	----------

回顾与展望:中国翻译界 10 年大辩论(1987~1997)	
--------------------------------	--

.....	郭建中(126)
-------	----------

艺术与科学:词义考略——兼谈奈达果真放弃了他的	
-------------------------	--

“翻译科学”观吗?	范守义(147)
-----------------	----------

论翻译学的基础研究.....	林 璋(171)
----------------	----------

翻译研究已经是一门人文科学.....	陆兴华(182)
--------------------	----------

谈翻译观念的嬗变与对话意识的建立——兼谈新时期的	
--------------------------	--

翻译观.....	吕 俊 侯向群(190)
----------	--------------

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	张经浩(203)
---------------------	----------

2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	许 钧(219)
二元对立与第三种状态——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的哲学思考·····	杨晓荣(231)
翻译的对象——异质性·····	蔡新乐(246)
形合与意合的哲学思维反思·····	张思洁 张柏然(258)
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	葛校琴(275)
略论西方现代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中的作用·····	申 丹(283)
在阐释和模仿之间——作为翻译研究的符号学·····	陈建中(301)
“道”与“逻各斯”在汉诗英译中的对话·····	刘华文(316)
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	姜秋霞 权晓辉(330)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杨金才(342)
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金 明(353)
翻译与阐释的多元——从《锦瑟》的英译谈起·····	祝朝伟(371)
语义古词:俄国古典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为例·····	王加兴(387)
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	袁 莉(397)
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多元功能·····	刘云虹(410)
谈文学名著的复译·····	孙会军 郑庆珠(422)
系统功能观与辩证论译·····	萧立明(433)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翻译的解释能力·····	刘英凯(446)
逻辑翻译学构想·····	阎德胜(467)

文化翻译探索——兼评 David Hawkes 译屈原《天问》	刘宓庆(486)
文化与翻译.....	孙致礼(516)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	王 宁(528)
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翻译研究方法——社会符号学 翻译法.....	陈宏薇(541)
文化—语言霸权的个案分析——论汉英翻译工作者 的劣势.....	徐式谷(560)
翻译文化——21 世纪译学研究课题之一	王克非(565)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	王晓元(575)
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	刘全福(589)
中国翻译教学百年回顾与展望.....	穆 雷(608)
同声口译理论探析.....	鲍 刚(628)
翻译的动态研究与口译教学.....	刘和平(642)
译者的工作心理.....	方梦之(655)
论小句作为机器翻译的基本转换单位的可行性研究	罗选民(666)

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杨自俭

南京大学张柏然和许钧两同志要编一本《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希望我也写一篇文章。我思索再三，越想越乱，越思问题越多，多次伏案执笔，还是理不出思路。又想世纪之交，需要回顾，需要展望，需要提出问题，学术上常说提出问题也算研究，于是我就想提出想到的一些问题，供我进一步思考、研究，也供同行们参考，不知对下个世纪的译学研究能否多少起点作用。

一、我们下个世纪译学研究的基础是什么？

笼统地说是中外译学研究的成果和翻译实践提出的问题。具体一点就是中国译学研究的成果有哪些？外国译学研究的成果有哪些？中国翻译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实践提出了哪些问题？外国的翻译实践，尤其是近 20 年的翻译实践提出了哪些问题？再具体一点地说，罗新璋先生指出：“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罗新璋，1984：18）这个理论体系呈什么形态？包括哪几个层次？它是何时构建成的？谁是集其大成者？这个体系完整不完整？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改造或改进？黄龙先生的 *Translatology* 和刘宓庆先生的《当代翻译理论》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理论体

2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

系,对此我们除提出上述一类问题之外,还有罗、黄、刘三体系有哪些相同之点和不同之点?他们各自是怎么构建起来的?三者在中外译论史上应各占什么地位?我们怎么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对国外的译学研究也如此。古代的不说,仅就现当代的一些有影响的译学研究者比如雅可布逊(R. Jakobson)、费道罗夫(A. В. Фёдоров)、加切奇拉泽(Т. Р. Гачечиладзе)、巴尔胡达罗夫(П. С. Бархударов)、奈达(E. Nida)、纽马克(P. Newmark)、卡特福特(J. C. Catford)、斯坦纳(G. Steiner)、霍姆斯(J. S. Holmes)、维内(J. P. Vinay)、穆南(G. Mounin)、威尔斯(W. Wills)、巴斯奈特(S. Bassnett)、贝尔曼(A. Berman)、贝尔(R. Bell)、托尔曼(H. Toltman)、萨沃里(T. Savory)、吉思兹拉(E. Gentzler)、拉菲维尔(A. Lefevere)、布格兰德(R. Beaugrande)、巴恩斯通(W. Barnstone)等。他们在翻译研究上都做了哪些贡献?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哪些精华部分?外国的翻译理论跟中国的翻译理论有哪些相同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产生其异同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除了提到的这些人以外,有贡献的还有好多,都应在我们今后研究的范围之内。总之我们要建立翻译科学必须加强中国译论、外国译论和翻译实践三个方面的研究,将三个方面研究的精华结合起来,创立新的观念和新的范畴,创建新的理论体系。

二、中外译论的研究怎么样结合? 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怎么样结合?

我们的老一辈和我们这一代都讲了很多“结合”,如“中西文化的结合”,“中西医结合”,“外国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西语

言学的结合”，“中西译论的结合”，“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等。到底怎么样结合却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问题。吕叔湘先生谈到一般语法理论与汉语实际的问题时说：“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1）

我想结合不是两种东西相加，也不是两种东西相互套用或借用，结合有些像动植物“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两种结合物中有一个为基础，比如植物“嫁接”要以砧本为基础，动物“杂交”要以母体为基础。砧本与接穗的关系，母体与雄体的关系不是二者等同的关系。我们说的中外译论相结合要以中国译论为基础，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要以翻译实践为基础。其他两个方面都是“接穗”性质的东西。知道了砧本和接穗还不行，还要找到生长点。如果接穗没接到生长点上，这嫁接便是徒劳。那么中国译论的生长点在哪里？翻译实践的生长点在哪里？我现在还说不清楚，但主观感觉好像都在我们的翻译观念上，比如什么是“翻译”，什么是“翻译实践”，什么是“翻译理论”，什么是“翻译科学”，什么是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以及翻译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等等。在这些基本观念上看看我们前人以实践与理论上都积累了哪些宝贵的东西，这些宝贵的东西总得有些相互联系的线索，总得包含着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把外国的这样一些宝贵的东西拿来跟我们的加以比较，再经过反复加工，“化合”成一些理论形态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这样是不是就有了一种理论的新品种的性质。这样的新品种可能很多，那就是多元化，从多元中找出共同的东西，就应该是一体化。下个世纪的译论发展是不是就是多元化与一体化相

辅相成的趋势。

三、翻译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具备哪些条件? 现在已有了哪些条件?

翻译科学像其他学科一样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般说应具备 4 个条件:一批基本范畴;这些范畴界定明确并且前后一致;这些范畴按逻辑(不只是分题目排序)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其理论普遍有效。按照这 4 个条件,对照中外译学研究,可知任务还相当繁重。一批基本范畴共有多少?都是哪些范畴?至今中外还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清楚。范畴界定不清,当然也就无法前后一致。中外译学界一些关于范畴的争论说明这个条件还不成熟。前两条不成熟自然后两条也就无法成熟。但是我们认为黄龙先生的 *Translatology*,特别是刘宓庆先生的《当代翻译理论》在这方面为我们的译学建设打下了一个有成效的基础,我们应认真研究、继承和发展。

四、译学建设需要哪些学科的支持? 应从这些学科中汲取些什么? 借鉴些什么?

学科建设也像人成长一样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尤其在当代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情况下,只靠自身,不争取其他学科的帮助难以有较大的突破性发展,所以译学研究者除借用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帮助外,还应借用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符号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美学、新老三论、数学等学科的帮助。

除了上述这些学科还需要哪些学科的支持？我现在说不明白，我想这是个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在不断变化的问题，随着学科的衰老与新生，相关学科也不会是固定的。我们要从其他学科汲取的主要是理论与方法。比如整体性、系统性、目的性、概括性、动态性、层次性、相关性等理论原则，还有定义与划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类比与假说等方法，可以从哲学、逻辑学、新老三论等学科中借用或部分借用。我们所说的借鉴主要是将译学跟其他学科尤其是跟成熟学科相比较，从发展史、学科内部系统到学科外部系统等方面找出差距，取长补短，充实发展自己。

五、我们应该创建什么样的翻译科学？是适应两种语言互译的具体翻译科学，还是适用各种语言互译的普通翻译科学？

这个问题有些人提出过，比如威尔斯提出要建立普通、描写、应用 3 门翻译学，谭载喜提出要建立普通、特殊、应用 3 门翻译学等。还有人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语言学上常用“普通语言学”与“具体语言学”相对应，也常用“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相对应。我想翻译科学的建立可以把“理论翻译学”分成“普通理论翻译学”与“具体理论翻译学”，前者主要研究关于翻译的一般规律，适用于各类语言之间的互译；后者主要研究某两种语言（比如英汉、英法、俄汉、日汉等）之间互译的具体规律。二者的建立谁先谁后，不应有固定模式，而取决于条件成熟的先后；二者的关系应该像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像普通语言学与具体语言学的关系。目前我们应首先建立“普通理论翻译学”，因为中外